

绪 论

中国古典神魔小说《西游记》，写作于明代中叶的嘉靖、万历年间，是吴承恩在《大唐西域记》、《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西游记平话》、《朴通事谚解》及金院本《唐三藏》，杂剧《唐三藏西天取经》、《西游杂剧》等史书、传记、平话、舞台剧本、民间流行的神话和传说的基础上，经艺术创作而成。

《西游记》研究经过四百年的积累，取得了丰富的成果。从历史追溯，金陵世德堂《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简称世德堂本），首刊发行是在万历二十年（1592）。卷首所载的《刊西游记序》是古代《西游记》评点的发轫之作。由于当时盛行的“心学”思潮，揭示其“心学密谛”的李评本《西游记》成为第一个成熟的评点本，成为“明人研究《西游记》的最佳总结”^①。进入清代，出现了以《西游记道书》、《西游真诠》、《西游原旨》、《通易西游正旨》、《西游记》、《西游记评注》为代表的“证道”观；以《新说西游记》为代表的“释儒”观；其间亦掺杂着“三教合一”的“谈禅”因素，多以《易经》、《大学》、仙道来解释《西游记》。^②这时的研究由于批评脱离客观文本，致使产生些曲解附会的理解与论述。

真正实现了《西游记》研究的时期是1919年“五四”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鲁迅、胡适、郑振铎、孙楷第、陈寅恪等一大批研究《西游记》的学者，取得不俗的业绩。如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胡适的《〈西游记〉考证》；郑振铎的《〈西游记〉的演化》；孙楷第的《中国通俗小说节目》；陈寅恪的《〈西游记〉与玄奘弟子故事之演变》等书文，对《西游记》

①黄霖.中国小说研究史[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101.

②臧慧远.《西游记》诠释史论[D].济南:山东大学,2011.

的作者、成书、主旨、演化、故事渊源、人物原型乃至版本，都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与研究，并提出许多令人玩味不已的真知灼见。但是，由于社会历史环境和资料占有匮乏的限制，令研究者在探讨与研究中出现某些困惑，没有金批《水浒》、毛批《三国》、张批《金瓶梅》和脂批《红楼梦》那样优秀的评点本可资依凭，使得千古疑案的百回本《西游记》仍为“海内一大闷葫芦”^①。

当代《西游记》的研究，开始逐渐由单一性走向全面繁荣的阶段。“文革”之前，因为特殊的政治气氛，研究者多用社会学、阶级斗争的学说来分析解释，并侧重于探讨主题思想。这一时期，取得的主要成果汇于《〈西游记〉研究论文集》中。“文革”十年，为《西游记》研究的“真空时期”，罕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论文，仅有郭豫适、简茂森为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版）而撰写的长篇《前言》，其中分析了《西游记》的故事演变、成书过程以及思想主题，艺术特色等，可谓这一时期仅有的严格意义上的学术文章。“文革”后的八十年代至今，《西游记》研究开始呈现全面复兴而繁荣的景象，专著和论文在数量与质量上均呈上升趋势，可谓硕果满枝。据陈大康先生统计，仅1950年至2000年间，国内各类报刊就刊发《西游记》研究论文807篇^②。加上1950年之前的，总量约在850篇左右。进入20世纪还出现了80多部研究专著。由此可见，对于《西游记》小说的研究也是在不断升温，而且自有特色。

本书着意从《西游记》的思想价值和独特文化精神上进行研究，这是《西游记》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和有机的组成部分。“具体而言，在宗教性主题研究方面，自20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鲁迅、胡适二位先生的猛烈抨击‘《西游记》突出于游戏，并无微言大义’^①之后，逐渐归于沉寂。”^②直到80年

①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334.

②陈大康.研究格局严重失衡与高密度重复——兼及学术腐败滋生的著述环境[N].文汇读书周报，2002-9-6

代“拨乱反正”后,才有研究者从宗教角度进行探讨。如冯扬、周克良等提出的“佛教中兴说”;王敏、金声等提出的“佛法无边说”;李安纲、郑启宏等提出的“道教修炼之术说”等。本书力图借鉴众家之长,从佛禅思想给予新的考释,试图进一步加深《西游记》和佛教思想的认识。力求向哲理和宗教的双重趋向归去。

由民族的宗教信仰及意识等形成的宗教文化,是人类文明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其滋润处,令心帆慈航,感同身受,益受无穷;其光芒之处,令人茅塞顿开,如施法雨,孽障远遁;其因果之处,仁者爱人,福乐饶益,善行尽了,恶行恶报。世人只要一点一滴地积累善根,则三界必会化为清净莲池,五浊恶世也定会变为人间净土。

吴承恩著作的百回本神魔小说,作为一部充满东方智慧和东方哲学的不朽巨著,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世人和学人的钟情,亦引起古今许多有识有智慧者的点评与论述。其深刻的思想和精湛的艺术,乃至蕴含其中的儒、释、道之宗之本,已经成为破译人生密码的弥足珍贵的灵魂钥匙。因此,“西游学”正方兴未艾,其中显然有许多争鸣性的观点与意见。

(一)明清时期。“对《西游记》的研究主要以评点、评述为主,于是相继出现了《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西游证道书》、《西游真诠》、《新说西游记》、《西游原旨》、《通易西游正旨》、《西游记记》、《西游记评注》等九个版本,还有众多文人的笔记、札记、序跋和散评^①。”陈元之在《西游记序》中,把《西游记》当作了降心除魔、修身正道的寓言书。唐光禄和华阳洞主人则认为《西游记》是荒诞离奇的“此东野之语,非君子所志。以为史则非信,以为子则非伦,以言道则近诬。吾为吾子之辱!”李

①薛梅.心学视野下的《西游记》研究-《西游记》与阳明心学之关系研究述评[J].明清小说研究, 2009(2):65.

②(明)陈元之.西游记(百家汇评本上下)[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7:4.

③陈宏,杨波校.李卓吾批评本《西游记》(上下)[M].长沙:岳麓书社,2007.

卓吾则认为“篇中云‘释厄转’，见此书读之可释厄也。若读了《西游记》厄仍不释，却辜负了《西游记》么？何以言释厄？只是能解脱便是。”闲居之士不可一日无此书，供消遣耳。他的解读已经接近了作者的本意，但其存有的纰漏，却使得后人不停地发展和补充。悟一子陈士斌把《西游记》的主旨归于“太极一气^①”。博学鸿儒尤侗在《西游真诠序》中指出《西游记》是将儒教之“存心养性”，道教之“修心炼性”，佛教之“明心见性”融为一体，专注在“心性”二字^②。《华严》讲心法，《悟真》、《参同》讲炼丹，再将二者相合以《周易》之太极、二仪、四象、八卦等为结构变化，即是一部“三教合一”的《西游记》，并说“能解《西游》者，圣人之徒也”，从而彻底摆脱了那些仄陋腐儒的狭隘性的偏见。

尤侗论证《西游记》为“三教合一”的思想后，张书坤在《新说西游记总批》中，又站在捍卫儒教道统的主导地位上，言道：“今《西游记》，是把《大学》‘诚意正心，克己明德’之要，竭力备细，写了一尽，明显易见，确然可据，不过借取经一事，以寓其意耳，亦何有于仙佛之事哉！^③”“始知是一部圣经《大学》文字”，认为《西游记》是《大学》的注脚。之后，自号素朴散人悟元子刘一明，在《西游原旨》中指出：“《西游》贯通三教一家之理，在释则为《金刚》、《法华》，在儒则为《河洛》、《周易》，在道则为《参同》、《悟真》，故以西天取经发《金刚》、《法华》之秘，以九九归真阐《参同》、《悟真》之幽，以唐僧师徒演《河洛》、《周易》之义^④。”“混一三教，从而体现出《西游记》的妙处。《西游记记》、《西游记评注》则是对《西游记》文本“略节要旨，方便记半”^⑤，进行了总评和杂评。

①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352.

②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318.

③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327.

④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342.

⑤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337.

(二)明清《西游记》解读,始于金陵世德堂刊行的《新刻出像官板大字西游记》(世文),成熟于晚明《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李评本),全盛于清代“证道”“谈禅”“释儒”各派的评点。王国维、罗振玉、钱静方、蒋瑞藻开后世《西游记》资料整理汇编的先河。胡适、鲁迅先生对其作者身份、生平的论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及相关文献的搜集、整理及研究,构成了后者继续深入探讨的一个基本出发点。

(三)胡适先生在《西游记考证》中认为:“《西游记》被这三四百年来的无数道士和尚秀才弄坏了。道士说,这部书是一部金丹妙诀。和尚说,这部说是禅门心法。秀才说,这部书是一部真心诚意的理学书。这些解说都是《西游记》的大仇敌。现在我们把那些什么悟一子和什么悟元子等等的‘真诠’‘原旨’一概删去了,还他一个本来面目^①。”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一文中道:“至于说到这书的宗旨,则有人说是劝学;有人说是谈禅;有人说是讲道;议论很纷纷。但据我看来,实不出于作者之游戏,只因为他受了三教同源的影响,所以释迦、老君、观音、真性、元神之类,无所不有,使无论什么教徒,皆可随意附会而已。”^②

继胡适、鲁迅二先生之后,郑振铎在《〈西游记〉的演化》一文中,详细论述了《西游记》研究取得的成果,当前的难题,新证据的发现,《西游记》的地位,唐僧出世故事的插入,西游记故事的集合,成为现代《西游记》研究的全面总结。此外,陈寅恪、孙楷第、赵景深、董作宾、汪原放、刘修业、陈独秀、傅惜华、徐旭生等等,都分别阐述了观点和立场,将《西游记》的研究回归到了对文本的重视上。

(四)20世纪40年代,由于战争连年,对《西游记》的研究几乎处于荒芜地带。这一时期主要有郭立诚、糜文开、张静二、柳存仁、夏志清、余国藩、杜德桥、台静农、袁圣时、庄一拂、汪浚等人撰写的论文和对版本、人物、本

①胡适.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923.

②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2:269.

源等方面的研究与阐述。到了20世纪80年代,吴圣昔、朱其凯、方胜、胡晓之、欧阳健在《西游记新解》、《〈西游记〉——游戏笔墨的艺术结晶》、《论〈西游记〉的滑稽诙谐》、《〈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胡适〈西游记考证〉述评》等书文,都继承并发展了胡适、鲁迅先生的“游戏说”。针对《西游记》的题材性质,鲁迅提出了“神魔小说”的概念,胡适提出了“神话小说”的概念。笔者认为:说到文化内涵,“神话”一词只能概括《西游记》的外在形式;“神魔”一词既具有神话的外在形式特点,又能概括作品的丰富文化内涵,所以显得更合理、科学、审慎、恰当。

(五)当代《西游记》的研究可划分为三个时期:1949年至1966年主要有张默生、冯沅君、霍松林、黄肃秋、胡念贻、魏建功、沈康仁、严敦易等人撰写的论文。同时,也出现了一批具有较强的社会意识形态,与政治紧密联系,运用阶级斗争学说的研究文章,以张天翼、高明阁、沈玉成、李厚基、李大春、何其芳、李希凡、胡光舟、霍松林、童思高、苗壮等为代表,提出了“主题矛盾说”、“孙悟空投降论”、“主题转化说”、“主题统一说”、“西天取经说”、“讽喻现实,歌颂斗争说”。从1966年至1976年,这十年关于《西游记》研究的论文极少。到“文革”后期,随着评《红楼梦》、评《水浒传》运动的兴起,《西游记》的研究也偏离了正常的文艺批评的道路和范畴,而沦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庸。“‘文革’后七八十年代,相继出现了胡光舟‘歌颂反抗和光明正义说’、朱式平‘安天医国说’、朱其凯‘经国宁尼说’、罗东升‘诛奸尚贤说’、朱继琢‘反映人民精神说’、朱彤‘歌颂市民说’、陈民牛‘仁政治国说’、王齐洲‘追求正统与正义统一说’等等^①。”同时在80年代初的《西游记》研究的论坛上,还出现了一次全面否定《西游记》的思潮,即所谓“主题反动说”,认为《西游记》的主题是反人民的、有反动思想,认为其是“破心中贼”的政治小说。对于这种“文革”极“左”思潮的泛起,何满子先生在《把艺术从社会学的框

^①陈俊宏:《西游记》主题接受史研究[M].北京:商务出版社,1980:78.

子里解放出来——谈神魔小说《西游记》的社会内容》一文中，历数《西游记》主题中“硬化成分”、“强派角色”的种种弊端，急切呼吁主题研究的深入和突破。认为《西游记》研究不应贴标签，划阶级，因为“也许吴承恩根本无意将孙悟空当作反抗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孙悟空的改邪归正因此也不意味着阶级战士的屈服投降，也许孙悟空的被降服象征着邪不胜正的抽象哲学。”^①“20世纪90年代至今，学者们又从各个方面对《西游记》的社会性主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相继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如以吕晴飞、田同旭为代表的“反映时代思潮说”、以王辉斌、张锦池为代表的‘人才观说’、王国光的‘密码说’、李安纲的‘心路历程说’、田同旭的‘情理相争说’、方克强、杨义的‘神话母题说’、克珠群佩、王意如的‘崇佛（禅宗）说’、竺洪波的‘追求哲理和审美意义上的自由说’、康金生的‘宣传佛法及其政治作用说’、黄霖的‘弘扬人的自由和人性说’、以金紫千、石麟为代表的‘心性修炼说’、李安纲的‘金丹大道说’、孟繁仁、吴圣昔、冷铨清、黄霖、竺洪波、张书坤的‘人生哲理说’、余国藩、诸葛志的‘将功赎罪说’、冯扬、周克良为代表的‘佛教中兴说’、以王敏、金母声为代表的‘佛法无边说’等等。”^②出现了百家争鸣，各领风骚，蔚然大观，令人鼓舞的大好局面，令“西游学”的研究真正驶向了文本研究的正道。

中华文化瑰宝百回本《西游记》从基础研究入手，从本事角度探讨，不受各种社会思潮左右，不受名家已有定论的框制，不受诸多创作主旨阐释的束缚，在梳理出源流与走向，文本与意蕴的基础之上，从《西游记》佛禅思想考释入篇，进而在前贤时俊们的研究成果之上，为我国西游学的文化辨析，提供一点参考与借鉴的意见，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一个草根的力量，以上就是我研究百回本《西游记》的动机和目的。

①何满子.《西游记》研究的不谐和音[J].南京江海学刊,1983(1):22.

②梅新林,崔小敬.《西游记》百年研究:回视与超越[J].文艺理论与批评,2002(3):101.

第一章 吴承恩生存情态及其方内方外交游考

查证可知明代《西游记》的版本上并未署作者姓名。在学术界,谈到《西游记》的作者问题是长期争论而又未能解决的问题。到清初认为撰写者为长春真人邱处机。接着还有许白云说、宗泐说、鲁府朱观火定说、周王府朱睦神说、樊山王府集体创作说、陈元之说、华阳洞天主人说、李春芳说、史真人弟子说、尹真人弟子说、唐新庵说、唐皋说、阎希言师徒说、胶东人蓝田说等。而且以上说法均缺乏有力的证据。这样在21世纪20年代,自胡适、鲁迅以来,学术界都认同《西游记》作者是吴承恩。

第一节 吴承恩生存情态

吴承恩(约1506~1582),字汝忠,号射阳山人。先世为涟水人,后涉私阴(今江苏省淮安)。曾祖吴铭,为余姚训导;祖父吴贞,任仁和教谕。“两世相继为学官,皆不显。”^①终于没落为商人的家庭。父吴锐,四岁丧父,由母梁夫人领取私山阳故土居住。因“家世儒者,无资,且颠沛宦游,归益贫”^②。吴锐娶徐氏以后,就继承岳父的家业,经营彩缕文毂,薄利多销,以养家糊口。

说到吴锐,他是一个不善经营的小商人,闲时喜欢读书,具有文人的正义感。但是,在官府和社会的欺凌面前,也只能采取逆来顺受,忍气吞声,抑郁到73岁时撒手人寰,留下寡妻幼子苦熬春秋。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下,吴承恩在少年时代,便被市井中人称做“痴人家儿”,回家来既“恚啼不欲饮”,嗷嗷于不平的人间。

①吴承恩.西游记[M].长春:人民文学出版社,1955:7.(以下引同书版本相同者略去作者及版本)

②陈风国,丁文豪.新野文史资料选编,第1-20辑(下)[M].豫内资苑新出通,2011:655.

第一,少年时期,发愤读书,试图考取功名。吴承恩“髫龄即以文鸣(著名)于淮”^①,但又“屡困场屋”。但在父亲吴锐看来,常常受乡里恶少欺负和官府吏胥的敲诈,是因为家中没有人做官,所以,极其渴望儿子能考取功名,光宗耀祖。而吴承恩自少年起即发愤向学,博闻强记。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序载云:“(吴承恩)性敏而多慧,博览群书,为诗文下笔立成,清雅流丽,有秦少游之风”^②。陈文烛为吴承恩诗词选所做的《花草新编序》中又透露道:“生有异质,甫周岁未行时,从壁间以粉为画,无不肖物;而邻欠命其画鹅,画一飞者,邻父老曰:‘鹅安能飞?’汝忠仰天而笑,盖指天鹅云。邻父老吐舌异之,谓汝忠幼敏,不师而能也。”

袁行霈认为:“他从幼年起,就爱好神奇的故事传说,‘在童子社学时,每偷市野言稗史,惧为父师呵夺,私求隐处读之,比长,好益甚’。因之他具有丰富的民间神话和传说的知识,同时直接及间接地吸收了民间说话传统中的好东西,熟悉了这种形式,并且提高了自己的表现能力,这就使他能《西游记》这部幻想小说里充分发挥自己的天才”^③。

为了能够更好地了解吴承恩的科举之路,这里,我们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当时的科举制度。明洪武元年(1368)三月下令设科取士,十月定国子学制度,十一月用孔子五十六世孙孔希学袭封衍圣。翌年,令郡县立学校。三年(1370),京师与各行省大规模开乡试。明朝的科举分为乡试和会试两级。子、午、卯、酉之年,在各省省城举行乡试,也叫秋闱。考中者称为举人。辰、戌、丑、未之年,各地举子会集京师举行会试,也叫春闱,考试合格者称作贡生。“贡生再经过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考试合格者统称进士,分三甲张榜公布:一甲三人,分别是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人,赐进

①吴国荣.射阳先生存稿跋.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162.

②淮安府志.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164.

③袁行霈.中国文学史(第四卷)[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152.

士出身；三甲若干人，赐同进士出身。所有进士均由朝廷委以官职。这一切很快就制度化了^①。”

洪武十七年（1384）三月，由礼部奉命颁布了科举成式，规定乡试第一场试四书义三道，每道二百字以上，经义四道，每道三百字以上，“《四书》义主朱子集注经义，《诗》主朱子集传、《易》主程朱传义，《书》主蔡氏传及古注疏，《春秋》主左氏、公羊、谷梁、胡氏、张洽传，《礼记》主古注疏；第二场试论一道，判语五条，诏诰章表内科一道；第三场试经史策五道^②。”如此，科举考试的规则，考试的内容及被制度保证的利益，都已经得到权力的认可，但是知识与思想的边界却被限制得越来越窄。这种滥用皇权的行为，实际上不是为国家选拔人才了，而是为专制政权选拔奴才，严重阻碍了文化的进步，造成了学术必然衰颓的趋势。

第二，吴承恩中年时期，目睹封建统治弊端，提出改良主张。由于科场和官场双失意，认识到了当时政治的黑暗，社会的不平，于是提出了实行“王道”、“德治”的政治主张，希望革除科场，官场弊端，以便早日实现自己考取功名的愿望。那种入世的情节一直不减^③。

到了明朝永乐年间（1403~1424），朝廷又编成《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由成祖亲自作序，把“有发明经义者取之，悖于经旨者去之”，以致造成更多的“学者幼而读之，老而不知一言为可用者^④”，把本来具有相当深刻批评的程朱学说，演义成了政治权力与意识形态的诠释文本。到了吴承恩生活的青年时期，即正德、嘉靖年间，这种思想被主义强奸得淫苦的症状越来越明显，以致范景文在《来禽馆文集序》中说：“今之治攻具者，生吞注疏之剩语以为理学，褻缉策论之蠹括以为经济^⑤”。王阳明在《答顾东

①明太祖实录（卷一六〇）.明实录.第一册:532.

②明太祖实录（卷一六〇）.明实录.第一册:643.

③陈鸿.评析吴承恩创作《西游记》的目的[J].大家,2010(4):161-163.

④葛兆光.中国思想史[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259.

桥书》中甚至说到,由于思想边界的限定,很多士人只能将聪明智慧转向训诂之学,记诵之学,词章之学,并“纷纷藉藉,群起角立于天下”,甚至“时君世主,亦昏迷颠倒于其说”^①。此时的吴承恩在思想、信仰、文化上受到强烈撞击。遇到了家乡的名人蔡昂的赏识,曾作《鹤江先生诔》说,“昔受公知,昉(始)于童孺;登门识李,即以斯文见赏^②。”再后来,与沈坤交往,沈坤是南京国子监祭酒。据说在嘉靖三十四年(1555),倭寇入侵时,沈坤组织了一个千人的民团进行抵抗,并邀吴承恩作军师帮助出谋划策,大败倭寇,保卫了家乡的平安。

吴承恩大约在26岁前后与淮安望族叶氏之旁支的叶氏成婚。嘉靖二十三年(1544),已经44岁的吴承恩才补上岁贡生,在差不多熬了七年之久,才于嘉靖二十九年(1550)入京候选。在京的三年多时间,正是奸相严嵩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炙手可热之时。吴承恩入京候选的正月,恰逢严嵩七十大寿,他与儿子严世蕃操纵政权,气焰熏天。傀儡皇帝明世宗佞道,根本不理朝政,只在西苑修道祷天,“不问苍生问鬼神”,把国家的政治搞得乌烟瘴气,致使民怨鼎沸。

吴承恩《赠沙星士》说:“平生不肯受人怜,喜笑悲歌气傲然^①。”吏部候选的结果出来,吴承恩终获浙江长尖县丞的卑微官职。正如他在七言诗《长兴作》诗中所云:“风尘客里暗青袍,笔砚微闲弄小舸。祇用文章供一笑,不知山水是何曹。身贫原宪初非病,政拙阳城敢惮劳。”诗中抒发了吴承恩初学尝海不惮冗务的感叹,也有啸傲江海的遐想。

第三,吴承恩老年时期,以小说为武器揭露封建社会的丑恶现象。吴国荣在《射阳先生存稿跋》中叙之:“屡困场屋;为母屈就长光倖,又不谐于长官,因‘耻折腰’和母老家贫,第一次仕作吏,仅约一年便拂袖而归。”^②尔

①张炯,邓绍基,郎樱,王学泰.中国文学通史.第5卷.明代文学[M].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61.

②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162.

后,他还得过一个闲职,未到任便退官回淮安了,从此再未步入仕途。淮安汉为淮阳县,明为山阳县,淮水在城北五里流过。斯地江湖纵横,风光旖旎,地杰人灵,民风淳朴,民歌、民间传说灿若星汉,而哺育一代文豪吴承恩著出千古名著——百回本《西游记》。

吴承恩晚年无子,景况凄凉,唯有一支铁笔插向暮色苍茫的天地间。在为唐人传奇志怪小说《禹鼎志》作的自序中,“吴承恩自述道:‘幼年即好奇闻’,‘每偷市野言稷’,‘迨于既壮,旁求曲致,几贮满胸中矣’^①。”家庭环境的影响,考取功名的愿望与炎凉,官场倾轧的黑暗与无奈,封建社会上层的丑恶行径,终于促使吴承恩化沧海为心田,著作出百回本长篇神魔小说《西游记》。

“作者深感在现实社会中,自己的政治思想不能实现,对于当时那些‘五鬼’、‘四凶’,‘欲起平之恨无力’,于是就在民间传说创作的基础上,创作《西游记》这部神话小说,对封建社会里那些腐败黑暗的种种妖魔鬼怪进行扫荡了。”^②老年时期的他,在政治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已经没有了创作的《西游记》时,想要的揭露和批判封建统治者的丑恶行径,采取措施改良封建统治的雄心。

今天我们能查阅的吴承恩诗词古文的合集《射阳先生存稿》四卷本,含诗赋一卷,文三卷。第四卷的存词38首。是吴承恩死后,其表外孙丘度整理的。书初刊行时,距吴承恩去世不到10年。万历十八年(1590),《射阳先生存稿》有陈文烛和李维楨的序与前一年吴国荣所撰的跋。老友陈文烛在序中,对吴承恩推崇备至,比拟为陆贾,枚乘、匡衡、陈琳、鲍照、赵嘏和张耒,称吴承恩为“文潜之后,一人而已,真大河韩山之所钟哉!”^③

①张炯,邓绍基,郎樱.王学泰.中国文学通史.第5卷.明代文学[M].江苏文艺出版社,2013:161.

②西游记[M].前言.9、10.

③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163.

正如歌德的《浮士德》的情形一样,百回本《西游记》并非全是吴承恩一个人的功劳,而是在《大唐西域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西游平话》、《朴通事谚解》及《西游记杂剧》等的基础上,经吴承恩最后集大成。《西游记》的续书有南潜(董说出家后的法名)著作的《西游记》。

第二节 吴承恩文学思想的方外影响

欲揭示和探讨吴承恩的文学思想,首先必须看清他所处于时代的几种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以及与其相关联的几个主要人物的政治和哲学思想,方可见于其作品中的主张和意见。通过比较的方法,吴承恩的文学创作倾向自会水落而石出。

明朝自永乐以后,“台阁体”曾长期统治着文坛,给文学创作带来了严重的危机。其负面影响是创作篇章冗赘,内容贫乏,文风萎弱。这时候,统治阶级中某些较有见识的人士便希望有一种比“台阁体”有威望,能招徕人心的文体来带动它,以“扬治世之休,文运之盛”。如此,以前后七子为代表的复古运动,应这一要求而产生而发展^①。前后七子为代表的文学复古思潮极为盛行的时期,也是吴承恩所生活的年代。

弘治(1488~1505)年间,文坛上李梦阳、卓然以复古自命,试图矫正这种颓靡的文风。于是出现了“前七子”李梦阳、何景明、徐祯卿、边贡、康海、王九思、王廷相拉起的“复古”的大旗,形成了“台阁体”。提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口号。到了嘉靖(1522~1566)年间,又有“后七子”继之而起,李攀龙、王世贞、谢榛、宗臣、梁有誉、徐中行、吴国伦,再一次将把复古文学运动又推向一个新的高潮。遵循着他们的复古理论,并把他们的创作当作楷模,使得复古文学运动成为一时的风气。受上述前后七子领袖人物的文学复古的思想主张和理论蛊惑,同代大部分知识分子受其影响,竟然达到

^①雷震. 试论前后七子与“公安派”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对立[J]. 延安教育学院学报, 2004(6): 33-34.

“物不古不灵，人不古不名，文不古不行，诗不古不成”^①的程度。

前后七子的复古理论的内容主要可以概括两点：一是他们的文学发展观，即极力推崇先秦两汉散文、汉魏古诗和盛唐的近体诗都是绝对完美的，以后的诗文则一代不如一代，缺陷繁多^②。何景明认为：“近诗以盛唐为尚，宋人似苍老而实疏卤，元人秀峻而实浅俗^③。”王世贞则认为：“西京大文实。东京之文弱，犹未离实也；六朝之文浮，离实矣；唐之文庸，犹未帝浮也；宋之文陋，离浮矣，愈下矣。元无文。^④”何、王二人虽然指出了宋元诗文的弱点，但却从这些现象得出了文学每况愈下的结论，未免太主观武断，实际是一种谬误的“文学退化论”的观点。二是他们的创作观，“学不的古，苦心无益。”在他们看来，最好的办法是把那些绝对完美的东西当作范本，从篇章结构到句法、词汇都进行模拟，模拟得愈像愈好，用不着自己来创造一种独特的风格，一切唯古人为尚。结果，在复古理论的指导下，产生了一大批佶屈聱牙的临帖式的“假古董”。最后，“公安派”对它进行了有力的抨击，终令统治斯时文坛的复古派土崩瓦解。

复古派领袖李梦阳也终于从“圆规而方矩”的泥淖中转变到“出风入雅”之境，提出了“真诗乃在民间”的著名命题。副帅何景明也在总结前人的艺术经验的基础上，试图摸索新的创作途径。在学古的问题上，与李梦阳有争论。他反对李梦阳“刻意古范，铸形宿模，而独守尺寸”。从古人入必须从古人出，从而达到“自创一堂室，开一户牖，成一家之言^⑤”。这种既继承传统，又有创新，并形成自己独特艺术风格的立论是可取的。同时也认为，

①李开先.昆仑张诗人传.宋克夫编.宋明理学与明代文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56

②徐又良.试论李贽文学思想的体系性及其创新性[J].黄冈师范学院学报.2001(6):16-19.

③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宋克夫编.宋明理学与明代文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54.

④王世贞.艺苑危言校注.卷一.宋克夫编.宋明理学与明代文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54.

⑤何景明.与李空同论诗书.宋克夫编.宋明理学与明代文学[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154.

李梦阳等人为矫正当时蝉缓冗沓、千篇一律的台阁体文风做出了贡献。

在前七子复古运动声势烜赫的时候,就有一些作家并不盲从,起来反对复古派的文学理论,并且明确提出自己的文学主张。代表人物是王慎中、唐顺之、茅坤和归有光。这些人有着相近的文学见解,都推崇唐宋散文,并有意识地把唐宋散文当作曲范来学习,因之被称作“唐宋派”。唐宋派的文学活动始于嘉靖初年,当于前七子的领袖人物李梦阳、何景明逝世而后七子尚未继起的间歇期。唐顺之就曾以嬉笑怒骂之笔痛讨。他在致友人蔡可泉的信中说:“兄试观世间糊窗棂、塞瓶瓮、尘灰朽腐满墙壁间,何处不是近时人文集,有谁闲眼睛与之披阅?若此者可谓之不朽否耶?本无精光,遂尔销歇,理固宜然。设其人早知分量,将几块木板留却柴烧了,岂不省事?可笑可笑^①。”虽然,辱骂和恐吓不是战斗,但“本无精光,遂尔销歇”这八个字,正一针见血地指出了复古派的要穴和根本缺点,因为他们最缺乏的就是思想和艺术的光辉。但是,由于唐宋派是站在道学家的立场上看问题的,自己又拿不出什么新的东西,且偏重散文而无诗歌上的建树,所以始终未形成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

继唐宋派之后猛烈攻击复古派并且获得显著成绩的是李贽和受李贽影响的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三人为首的公安派。他们所提出的文学主张是与复古派针锋相对的,且和唐宋派的文学主张是建立在不同的思想基础上的,某些地方甚至达到原则性的分歧,并在某种不同的程度上带有反道学的色彩。公安派的代表人物李贽是位杰出的思想家,为左派王学的突出人物。

相比较之下,吴承恩在《留思录序》中说的“呜呼!是辑也野人之辞也。吾观于野,而知情之极挚,评议之所生矣”^②,更接近于好诗好文在民间的观

① 蔡可泉答蔡可泉书。郭银星编选.唐宋明清文集(第2辑)明人文集·卷2[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94:668.

② 刘修业辑校.吴承恩诗文集(第2卷)[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59.

点。笔者认为：所谓“吾观于野，而知情之极挚，文之所生矣”，意思是说社会与生活是文学创作的源泉，而真实的强烈的思想感情才是创作的源头，是符合创作规律的。这种观点较之唐宋派的“必本乎道”和李贽的“童心说”更进步了一大截。对公安派文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对以后的评点派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同时，他的情极挚、文由生的观点，也颇合文学创作的本源，是正确的视点。没有生活就没有真实性，失却了真实性的文学艺术就不能感染人，不能给人以审美的体验与快感，是有由头的。

吴承恩在《花草新编序》中，对历代诗词的盛衰作过如下的评论：“诗盛于唐而衰于晚叶。至夫词调，独妙绝伦，宋虽名家，间有未逮也；宋而下，亦未有过宋人者也”^①。在吴承恩看来，诗歌在盛唐已达到巅峰；至于词调，“宋虽名家，间有未逮也；宋而下，亦未有过宋人者也”，这与当今唐诗宋词的观点是相一致的。“汝忠谓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近时学者，徒谢花而不知蓄多识，去陈言而不知漱芳润，即欲敷文陈诗，溢漂囊于无穷也难矣！徐先生与余深韪其言”^②这段话经过清人朱彝尊的转述，其意思更清楚些：“汝忠论诗，谓近时学者，徒欲谢朝花之已披，而不知漱六艺之芳润，纵诗溢漂囊，难矣。故其所作，习气悉除，一时殆鲜其言”^③。

对此，笔者特别赞同并支持魏文哲在《论吴承恩的思想》一文中的剖析与观点：“所谓‘文自六经后，惟汉魏为近古；诗自三百篇后，惟唐人为近古’，这种论调与明代前后七子的‘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思想主张完全是一个鼻孔出气，所以后七子之一的徐中行与他的好友陈文烛对吴承恩的这番话

①刘修业辑校.吴承恩诗文集(第2卷)[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65.

②刘修业辑校.吴承恩诗文集(第2卷)[M].北京: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60.

③《明诗综》第48卷,转引朱一玄,刘毓忱.《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165.

都表示赞许。所谓‘谢朝花’，‘去陈言’，是指在创作上不要堆砌华丽的辞藻，也力戒千人一腔，陈词滥调；所谓‘蓄多识’，‘漱芳润’，是要求文人学识加强儒家经典的学习、继承和发扬，同时必须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积累丰富的生活经验。这就是他们的文学思想中最不合理的地方。”^①笔者也认为，这与在政治上推尊三代之治，拥护儒家的仁政、王道的思想是相一致的。

百回本《西游记》是吴承恩天才的发挥，更寄寓着他一生的理想和愿望。孙悟空在闹天宫的结局虽然是悲剧性的，但被压五行山下和皈依佛法，也是故事情节发展上的必然要求，作者无力也很难在这关键的地方任意移轍。但在取经路上安排的九个国度，好多国家都是“文也不贤，武也不良，国君也不是有道”，特别是对车迟国王，比丘国王的描写都曲折地反映了他所处的时代，是针对明世宗佞道灭佛、祸国殃民而发出的呐喊，并寄寓着对黑暗现实的批判锋芒。

第三节 吴承恩的交谊

吴承恩一生经历五朝(1488~1619)，分别是孝宗(弘治)、武宗(正德)、世宗(嘉靖)、穆宗(隆庆)、神宗(万历)。明代这五朝政治极度黑暗，阶级矛盾尖锐，反抗的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吴承恩处于一种政治上压抑，经济上贫穷，仕途停滞的状态。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通过夺取元末农民大起义的果实而建立朱氏明朝后，一方面在政治上建立高度的封建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另一方面鉴于元朝被推翻的历史教训，对农民采取“让步”政策，致使社会经济逐渐恢复起来。鼓励垦荒，减轻税负，兴修水利，抑制豪强，恢复工商业和手工业等政策，直到后来的永乐、洪熙、宣德朝也继续得到贯彻。经过明初的休养生息后，生产得到恢复和发展，繁荣局面出现；而同时封建统治时期也开

^①魏文哲：论吴承恩的思想[J]，明清小说研究，2012(3)。